新美学与生态城市主义论坛
Forum on New Aesthetics and Ecological Urbanism

本次“新美学与生态城市主义（New Aesthetics and Ecological Urbanism）”网络论坛邀请了始终战斗在景观设计与建筑教学第一线的李迪华、董豫赣、王昀老师，请他们畅谈过去十几年中的教学体会、实践感受和对学科未来发展的朴实建言，并对新美学的内涵做进一步地阐释和探讨。对于生态城市主义的产生、发展与实践，我们邀请了具有资深规划经验与中外学习背景的王晓川老师、积极倡导建立“最绿城市”的温哥华市市长罗品信先生，请他们从实际与操作者的角度为大家解读这个方兴未艾的前沿理论。以“穿越西方，回到传统”一语打动编辑们的张旭东教授，给设计行业里的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观察与反省自己的所思所行。内容异彩纷呈，不容错过。

The Voices of “New Aesthetics and Ecological Urbanism” interviewed Mr. Dihua LI, Yugan DONG and Yun WANG, who have been striving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e for years, to talk about their decade-long teaching experienc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ir opin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ubject and their understandings and views on new aesthetics. As for the creation,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urbanism, we invited experienced Mr. Xiaochuan WANG who has studied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and Mr. Gregor ROBERTSON who actively advocates plan of “the World’s Greenest City” as the Mayor of Vancouver, to define the new thriving theory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Professor Xudong ZHANG provided the industry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to understand and introspect our thoughts and deeds by “across the West and back to the tradition”, which also impressed the editors. In all, the Voices is colorful and constructive.

在多样环境中培养佼佼者
Diversity Fosters the Best

王昀：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方体空间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Yun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Peking University; Chief Architect of ATELIER Fronti.

LAC：请您简要回顾一下北大建筑研究中心从2000年成立以来的这段历史。

王昀：我2001年来到建筑中心的时候，这里已经开始招学生。我当时在东京刚毕业，正好张永和老师去东京开会，一个偶然的机会就碰上了，他希望我回来。特别是他给我介绍的北京大学提倡在建筑中心设立双轨制的教学模式对我比较有吸引力，因为这种教学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建筑学教育方法，教师一方面有建筑实践，另一方面按照工作室的概念办学。北大这样宽容、开放的平台不仅非常具有吸引力，更是国际上普遍的一种建筑学教学模式。于是我欣然地接受邀请并于2001年的11月份回来。那时候，董豫赣老师、方拥老师都已经到任了，除了张永和老师以外，我应该是第三个到任的教师。

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特别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因为建筑不仅仅是理论，建筑是一种实践性的工作，在建筑教育中，只有老师有了实践的经验之后，他才会有更多的体会，才会将他在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挫折、思考告诉学生。如何用建筑语言去表达建筑师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生活的理解、对于文化的理解，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在教学当中努力去传授的。

LAC：在北大这样一个平台之上，建筑研究中心的老师们有没有一种共同的认同感？

王昀：我个人理解所有老师共同的认同感就是要将自己对于建筑的理解、研究传授给学生，但并不是所有的老师对所有建筑问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而恰恰是这种不一致性，构成了北大这样一个具有宽容性和丰富度的平台。例如，董豫赣老师虽然是学建筑学出身，可是他对中国传统园林很感兴趣；方拥老师本来是学西方建筑史出身，但现在改成中国传统建筑研究了。董老师的“中国古典园林赏析”和方老师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赏析”这两门课，在北大受到很多年轻学生的喜欢；方海老师是学中国建筑史出身，现在研究西方的建筑和家具。虽然我们中心老师人很少，但每个人对于建筑问题的视点都不一样，对于学生来说，这应该是最幸福的事情。正是这种学术上的不一致性，甚至是矛盾，学生才能够学会如何分辨。这是目前建筑中心的一个主要特点，这点实际上在国内建筑学学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同。

LAC：北大是这样一种宽容和开放的教育平台，如果学生做了一件非常独特的作品，但是您觉得这个作品是有问题的，那您怎样跟学生沟通，既保证北大的宽容和开放，又能纠正其错误的地方？

王昀：我并不认为所有不一样的东西都是好的，这有点像学书法，比如说我也可以狂草一下，可能不懂书法的人看后会觉得写得也不错，但是懂书法的人一看，就会知道什么是瞎写，什么是有章法的写，透过你的书法会发现它的脉络。我认为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讲，来龙和去脉很重要。

如果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被思考过，我们的任务不过是重新思考而已，那么关键是什么？人类的社会要发展，就必须在思考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我希望北大的学生要学会分析，要有自己的判断和智慧，而不仅仅是有知识。知识可以通过看书来获取，但是智慧就需要你的思考，需要对问题有深入的理解。我们一直在讲北大培养的是创新型人才，创新是在有深厚的研究和更高层次的分析基础上进行的。对我们新的学院而言，我认为积累很重要，如果我们10年、20年都不断地思考某一个问题，那么肯定会有一套研究成果，也会培养出一代创新型人材，对世界有所贡献。我认为建立研究室制度是培养创新型人才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大学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否则的话没有意义，所有的学生就跟过客一样，上了几年学，拿个学位证毕业，这毫无意义。我们要培养学生热爱这一行，而且要让学生自己去努力，而不是我们强迫他学习。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建筑学研究中心早在3年前就根据每个教师的研究方向采用了研究室制度，目的是希望能够对某一项研究有较长时间的积累。

LAC：新的学院成立之后，将会囊括建筑和景观学科。对于建筑中心的教育方面而言，景观是否会给建筑带来一些影响，或者会有一些怎样的改变？

王昀：首先，从建筑学的视点上来讲，建筑是我们生活组成的一个部分，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景观的概念，包含得更加广泛，广泛到只要我们一走出房子以后，我们面临的就是景观。但如果在这之间，还要加一个层次的话，那就是聚落了，比方说居住环境、小区环境，或者是城市环境、乡村环境。究竟如何去确认聚落的概念，我的理解是，它不仅仅是个体的房子，还要有房子和房子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可能也是景观的范畴。从一个抽象的范围来讲的话，像新学院以前的状态，景观和建筑这两方面都满足了人类生存环境各自不同的一面，但如果学院在未来能够对人类整体的生存环境，有一个从大到小的一体化整体思考的话，从土壤、植物等大的方面，小到家具方面，这些学科之间进行交融，在不同的层次、层面和不同的细节上来进行整体的思考的话，将会是我们这个学院的主要特点。

LAC：您刚才提到您一直很热衷的聚落研究，您怎样将它渗透到您的教学和实践之中的呢？

王昀：我想聚落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更应该是作为行动性的教学；不只是展示一张张图片，而是研究一个个活生生的现场。我希望学生能够到那些聚落现场里面去测绘、去体验，去看生活和建筑躯壳之间的关系，建筑虽然是一个壳，但是里面有活生生的活动，那种生活恰恰是在我们教学里面应该重视和提倡的。调查要感性，把你所有的器官打开，才能抓住那些敏感的细节。分析一定要理性，感觉的东西，你未必能够理解它，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你才能够更深刻地去感觉它，所以调查和研究、感性和理性是绝对不可以分开的，你感性的丰富会上升到理性，理性理解了以后，会让你更有目的地去观察。

现在每年我们都会带14、15个同学，到现场去测绘、实践。比如对古崖居的调查，中央电视台还专门为这个研究做了一个片子。今年我们还会出一本关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聚落调查的书。中国城市化进程很快，许多作为标本而存在的人类生活的样本，很快地就都会消失了，我们想抢在它还没有消失之前，把它挖掘出来，然后进行测绘、记录。这样做一方面同学们能够亲身去体验那些空间，看到生活和房子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能够把这个历史能够记录下来。

LAC：聚落相对建筑单体的尺度较大，该如何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聚落和城市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如何在做尺度比较大的城市规划时，将聚落的概念介入到其中？

王昀：过去建筑仅是一个房子的概念，它主要反映的是一个家庭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聚落则更是一个群体性的把握，它反映的是一个群体在聚居生活中的一种关系，而这种状态，事实上就是我们昨天的城市，不是今天的城市。恰恰是昨天城市里面展现出来的一些智慧能够给今天城市以借鉴。那么现在今天的城市虽然表面看起来很大，但它里面有小区，小区还要进行区块的划分，从这一点上来讲，其实城市是有10个、100个，或者大到可能是1 000个聚落的一个集合体，聚落的概念更是能够从大小之间的各个尺度来回应的。现在的学科划分得越来越详细，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学科都可以是一个专家，只要大家在任何一个环节或一个细小的点上，能成为专家或者能把这个问题思考得很深刻、很详细的话，这就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提供更多的智慧。这个可能是建筑师和设计师所需要做的。

聚落是人自发的、非常有人性化的一种自然流露的表达，它是根据需要，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磨合所形成的一种完整的样本。为什么叫样本，因为聚落毕竟不能够满足当今的社会生活，所以它只能作为一个样本来存在。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我认为聚落本身里面有许多东西可以对城市产生作用，但是现在的城市基本上是依据法规来做的，这就取决于法规的制定者如何思考。如果设计者一个人进行了一个大的城市整体设计的话，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城市应该是靠一群人的智慧来建立的，如果由一位设计师来做，就会像现在的某小区，一个面积为30~40万平米的住宅，却是简单地重复。也就是因为这种单调性，所有的人搬进了新房的时候，都会把设计师的想法全都拆掉，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装修业非常发达的原因。中国老百姓没有土地，不能自己盖房子，只能请开发商来做这些事情，可是这中间又没有设计师与最终用户的交流，加上当前的城市居民共同幻想的不复存在，所以城市的混乱景象，我个人的理解是不可避免的。

LAC：您在接受《中国建设报》的采访时也说过聚落研究是建筑师的牛奶，那如果请您给一个年轻的建筑师搭配一份营养餐的话，您会怎么样来搭配，比如说主食是什么、副食是什么？

王昀：我个人的理解，建筑师的主食首先是生活。为什么是这样？如果一个建筑师对于生活没有深入的了解的话、不去仔细地思考生活的丰富性和内容的话，他不会设计出好的房子。这种生活要考虑得非常细腻，比方说建筑师有

1. 石景山财政培训中心 © 王昀
2. 60平米极小城市 © 王昀

很多人也是参与设计家具的，原因是家具是人生活中接触到的“最小的建筑”。家具要给使用者一种什么感受，是需要我们对于生活的更加细心的观察和思考，这是一个建筑师必须要顾虑到和要做的事情。第二件事，是旅行和调查。建筑师要想理解生活，只有细致的理解还不行，你要看世界上不同地域的人，究竟是怎么样去解决生活问题的，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解决生活中问题的方式或方法。建筑师不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要了解各地特性之后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到特殊性，这一点对于建筑师而言很重要。在这两个基础上，其他的就是副食了。比如多读书、多思考，有一个会分析的头脑，具备了这些的话，你的设计就不仅仅是一个技巧的问题，而是在解决人的生活的问题。如何为人提供一个好的生存环境，这是设计的本质。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矿泉水瓶，为什么它的上部要做成曲线的？那是因为你在打开瓶喝水的时候，瓶里最后一滴水能够顺利地进到你的嗓子里。如果这个瓶的上部是方的，你会发现最后的一滴水是出不来的。器物的造型也是为人生活提供方便，不了解生活的人是做不好设计的。套餐剩下的部分，就看个人了。可能有人不爱吃蔬菜，就爱吃肉，有的人吃泡菜或吃咸菜也行，这就看个人的选择了。

LAC：在石景山财政局训练中心的设计中入口的大门和庐师山庄的白色锥体，这些是符号化的设计，还是有其特定的实际功能？

王昀：石景山财政局训练中心的门，确实也起到一定遮阳的作用，因为建筑朝南，太阳比较高的时候，它能形成一个非常大的投影，像一个大的挑檐一样，下面部分窗户都在阴影的范围里面。关于那个椎体，我个人认为这个庭院里应该有一个锥体，这样一种表达形式，我不想把它做成一个传统的中国园林，也不想把它做成一个日式的园林或者欧式的园林，我只想把它做成一个我心中的园林。

LAC：在“60平米极小城市”中，您将自己的家设计的有广场、街道……这些跟城市之间更加深层次的联系在哪里？

王昀：这有点俄罗斯套匣的概念，一层一层地打开以后你会发现，里面的娃娃是一样的，只是大小不一样。人的行为基本上是一样的，当你在城市里面的话，你会希望它有街道、有广场。你进了北大校园以后，你发现又进到一个世界里，又有街道、又有广场、小胡同。你进到家里面，你会发现有门厅、客厅、还有卧室，这些就是我们建筑学里面讲的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私密性空间。即使你进了一个私密性空间，它又可以分为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私密空间，这是符合人的心理变化的，就是从大到小、从开阔到最私密的一个状态。我认为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家和城市是一样的，它不是在造型上，而是在构造上有一个直接关联。人在行为上需要符合这种心理的阶梯变化，城市也需要。为什么会产生城市壁垒，是因为我们在城市中每天的身体、心理的阶梯发生的变化太大了。现在，如果你在办公楼里办公，还有自己私人汽车的话，你的行为会变成从办公楼一进电梯，钻进你的汽车里面上马路，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呆到你家的地下车库，然后到家。这一套逻辑系统中根本没有大空间的概念，完全是从封闭型空间再进到下一个封闭型空间，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会有精神紧张。我愿意找条小胡同，走一会儿再进一条胡同，希望回家的时候，而不是从一个大广场推门就进家了，这是人的心理上的一种关联或适应。

LAC：您很反对建筑的标新立异，但是您个人的作品风格性很强，这其中存在矛盾吗？您怎样保证您所想表达的意图通过您的作品完全地呈现出来，而不会在传递的过程之中会出现损失？

王昀：没有矛盾。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这一点恰恰构成了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你看来可能它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东西，但是它对我来说的话，就变成非常适合我个人观念的表述方式。比如说语言，世界上有几百种语言，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和我们说一样的语言，其他语种的语言我们可能也听不懂，但是别人也是在用这种语言来表达一种情感。建筑也是一样的，有很多种表达建筑的方式，我做的作品是我所理解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大家看来可能是挺有个性的东西。

在设计作品时，我把自己作为大众当中的一分子，我从来不认为设计师一定要区别于大众，这只不过是职业不同而已，就好像有的时装设计师设计的时装，我也不见得能理解。这个世界重要的不是说只有一种东西让你来接受，而是给你提供了无数种的可能性，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认可和需求去选择自己认可的那样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喜欢我设计的东西就足够了，我不需要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我的设计。但是如果只有两个人喜欢，那可能不会有商业价值，但是在文化方面，是没有任何被贬低的可能性。每一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LAC：您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风格也改变一下，让世界再增添一种多样性？

王昀：我认为世界多样性的填补是与每个“单调人”有关，而不是由一个人的多变而构成的，因为每一个人个性的不同、对于世界的理解的不同，世界的丰富性是必然的。尽管我个人的设计看起来似乎有些单调，但是，从一个全体的事业上看，可能是一种思考和类型的存在，是多样性中的一员。

学无止境的中国园林
No End to Chinese Gardens Learning

董豫赣：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
Yugan DO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Peking University.

LAC：据说您基本上应该是在没有任何的老师指导下开始研究中国传统园林的，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体系，您是怎样靠自己的力量去体会、理解的？

董豫赣：我想做一件事的时候，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如果喜欢一个东西，眼前根本看不见鸿沟，你看见的都是大路小路，走什么路其实你根本不在乎。我也想以合适的道路进去，但是在这之前并没有人把这条路搞清楚。比如讨论中国园林，基本都知道中国园林的很多价值判断都与山水画有关。可这只是一个事实，我认为事实是没有价值的。山水画、山水诗的价值判断是如何影响了造园这方面，少有人研究。所以我的第一步就是读完能找到的山水画论，还读一点关于山水诗的理论。其实在当代，只要一个人想做研究，我觉得会比任何时候都容易，因为资料很好搜集。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已经讲了4年的中国园林，每年讲的时候都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搞通了，等第二年再来备课的时候，就觉得去年的东西怎么那么差——但这种感觉非常好。最美妙的感觉就是做学问时觉得自己愚蠢得奇怪，你觉得自己愚蠢就证明你肯定比那时候强一点儿。

我现在有时候也会装模装样地看一点甲骨文——有一点很清楚，我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才看，我绝对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文字专家，或者把我的研究领域突然转向考古，或者转向甲骨文——慢慢地，它会变成某种比较锋利的工具，使你理解到之前理解不到的。有时候甚至需要一两年才能理解一个字。这意味着脑子里存在太多的问题，多到很混乱，你才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脑子里没有问题，而眼睛是被脑子指挥的，那么眼睛永远只会看见自己已知的东西，看不见未知的东西。

LAC：您曾说建筑师是您偶尔为之的一个职业，以您现在对园林这样的一种痴迷，是否会偶尔为之一下园林设计师呢？

董豫赣：我已经“偶尔为之”过好几次了。我最近做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屋顶花园，我从没刻意怎么安排过。我一个朋友有一间在18层楼楼顶的房子，有两个大露台，他把两处合起来，面积一共是60m^2。他跟我说，董老师，你要不给我做一个庭院？不到一分地。我说好，于是断断续续做了两三年，我还挺满意的。我第一次觉得，中国造园的魅力就是，它跟生活之间的那层关系：这个朋友以前是个极其忙碌的人，我觉得他更好的职业，不是做房地产，而是做一个植物学家，因为他迷恋植物。在有一个60m^{2}的园子以后，他自己在里面种了两棵桂花树，种了一棵黄皮，还种了一点儿别的。据他说，他现在基本上每天中午在那修剪他的植物，这已经成为他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LAC：您是否认可您在建筑与园林之间这样的跨界身份？

3-5. 膝园 © 董豫赣

董豫赣：其实我不认为它是跨界的。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对建筑是一个纯西方的理解，这意味着它把这个专业当成一个本体。本体要求有一个独立的评判标准，它只是对于建筑自身的思考。但我意识到，这其实是假的，哪个房子跟人（客体）没有关系？如果它一旦跟人的生活发生关系以后，园林对生活的思考提出了超出建筑本体的要求。以前你想你盖了这个房子以后，你也会面临一个甲方在这里头使用的一个问题。但那个使用仍然是对一个没有把它跟人发生密切关系的事物思考得过深的阶段，它是对一种物体的操作，操作一个建筑空间，或者操作其他的什么。我觉得这点上，梁思成先生当年做了一个区分，他认为中国的建筑不应该像西方那样把它当成一个单体评判，应该评判它周围与生活相关的一系列事情。在这个事情上，我并不觉得我的讨论是跨界的。

LAC：我曾在您的著作里读到您为您交道口的业主选树，您是从空间营造的角度，还是从植物的观赏角度来进行挑选的？

董豫赣：因为老北京就喜欢种石榴，正好他的朋友送给了他一株石榴。我觉得设计师强加给业主想法是极其不合适的，因为那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喜欢看着孩子，在将来的某一个季节，可以去摘石榴。如果我给他一种其他的选择，比如形式好看一点儿——这是一个美学问题，但美学只是符合某一类抽象的人的价值判断，我认为美学问题一定是在生活之后的。我希望我的设计将来可以越来越柔软，这个“柔软”的意思就是，当他已经有了一种可能性，比如他已经要了一棵石榴树之后，再有一种美学的考虑。作为一个建筑师，我有我的专业知识，我知道哪儿阳光最多，哪儿覆土最厚，我提供给他的只是这方面的参考。

我在想，最好的东西一定是确定的东西，而不是可能的东西。大家迷恋可能性是因为没有价值判断，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而柔软性不是答案的不确定性，我说的柔软性是一个东西跟另一个东西匹配的敏感性，应该是有很多方面的。比如就像我刚才讲的，有的时候因为土壤，有的时候是因为阳光，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在窗户里头看它的角度。匹配性越多，就越确定，你就越柔软。这种柔软是因为它有很多转折的角度，它的这种柔软越多，它也就越准确。比如，为什么一个小孩儿他跑步急转弯时不会摔跤？就因为他柔软，他转变方向变得比较敏感。就像我陪我儿子踢球，我就不敢向他那样转弯，因为我已经僵硬了，僵硬的意思是说我只会某种东西了。

LAC：您能具体谈谈您对于中国园林中植物配植的理解吗？

董豫赣：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手段、一种技术，是需要某种价值判断来指导的。对于中国的事物，我把它称之为“对仗”，它存在一种互成性，不会单独来讲。中国的园林最早的别名叫“林亭”，后来演化叫“林园”，然后才是我们后来现在叫“园林”。我们考察这里头的“林”是非常重要的。它甚至反映了中国园林跟时间有关系，而空间只是一个道具。有一个小说家叫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他提到一点：时间原有比空间更让人尊重的东西。我很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如果我们谈绝对的空间是可以跟人没关系的。可是如果在讲一个有文化的东西时，又怎么可能不去谈人。一旦谈人，就是在谈一个生命体；一旦谈生命体，就是在谈时间。我们谈的时间不是一个客观时间，是跟生命有关的时间。我们所做的所有的空间经营，它的价值由谁来判断？空间价值一定不是空间自身能给的。关于空间价值由谁来判断的问题，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时间，因为它是相关于生命的。

最后，你再回过头来看，林木在最早的文献里头，多半谈到的都是深远、幽远。在这个层面，它与时间的无限是有关系的。最早谈林木的是简文帝，在《世说新语》里记载过，“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翳林木鱼鸟，自来亲人”。“翳”就是遮住你让你看不清的意思。中国人追求空间不近看，追求深远、高远、平远，其所有的核心就是在追求远。也就是说他把空间的“远”当作是对时间“不尽”来追求的。所以我们在园林当中也永远不会让你一眼看尽。远近的概念原本是来源于时间的，如果从这里面一点点推敲，就能知道植物该如何来布置了。没有隐藏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眼看尽的东西，这在中国任何的艺术里都是很差劲的。仔细分析一下，这跟中国人迷恋的山、水、林木、云、石的价值基本上是非常地接近，这是一个远远大于任何个人趣味的价值判断标准。

LAC：在如今西方风尚的冲击之下，您认为当代中国还拥有这种一眼看不尽的、幽远的审美吗？

董豫赣：中国人和外国人还真不太一样。比如说种草坪，现在中国随处可见这种源自西方的景观手法。而为什么我反对它，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原本有聚会的一个理想，比如说在一棵大树，在某一个亭子旁边，或者是在一个篱笆墙外头。我觉得所有的设计，只要谈设计，就一定要讨论人。而且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抽象的人，或者一定要是一个文化人。比如在寄畅园，我会特别观察中国人喜欢待在哪儿，外国人喜欢待在哪儿。你会发现，外国人基本上都待在墙角，而中国人不会，中国人宁可挤在一个走廊里头，挤得满满的。假如同样是到那去聚会、聊天，他们会选择不同的地方，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证明中国人现在喜欢草坪？中国近代造园学者童寯曾说——对于有中国智识的人来说，只有奶牛才会对没有深远意境的草坪感兴趣。比如说，我做的类似于中国园林的那些东西，大家会觉得不符合当代，可是我觉得我们说的“当代”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譬如种几何草坪与带喷泉的几何水池就来自法国古典造园，今天的景观师们正在难以回避的拙劣地使用着，可谁又能告诉我，为什么中国古典园林偏偏就不适合当代人？

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这个年代讨论学术的困难就在于，同样一件事情在中国发生就一定是错的；在外国发生就一定是好的。更极端的例子是从我一个学生那来的，他跟我讲阿姆斯特丹，他说董老师你没去那，那太自由了，满墙上你可以随便画，地上全是口香糖。可这个事你要是放在中国，一定变成像世博会的丑闻一样。有些事情我觉得纯粹属于我们妄自菲薄。比如荷兰馆前的观众骑在雕塑上，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棒了，既然当代艺术曾因为实在没有落处，曾广泛希望着观众的互动性，那么互动性就是想方设法让观众跟作品发生关系，那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观众骑在雕塑上是丑陋的行为，而为什么不是行为艺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艺术是虚伪的。

传统也好，现代也好，必须拿出其中里头的具体问题，尤其是专业问题，我们才可以展开讨论，因为传统里头有好也有坏，现代里头也是如此。否则的话，我们就说人是消极的，如果说现代的就是好的，那么我可以坐着等死，因为这意味着你越活得长，东西做得越好，而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首先认为，谈我们的东西要跟上时代，这句话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不认为当代建筑是一个时代问题，它只是一个事实，它既不表示好也不表示差，我们过去一直会把这种时代当成一个褒义词，是因为不懂专业，比如说我这个人很“现代”，或者说这个东西很“摩登”，好像将“现代”等同于“好”，但没人会认为我说“现在很下午”是在夸什么，我这么说像是有病。时间并不能拿来当形容词使。

LAC：当初是什么吸引您来北大任教的？

董豫赣：我那时候在北京工业大学待了4年，没有老师知道我会做设计。他们以为我是个书呆子，只会教外国建筑史。因为我不大会跟一些太时髦的人谈设计，我只会跟彼此聊得来的人谈设计。那时候在工大，我会跑到白石桥去张永和的工作室和他聊天。你想想，突然有一天，你不需要再离开你的学校就能够跟这个人聊天，你会拒绝吗？你突然发现一个聊得来的人要办建筑学，你会拒绝吗？张永和是有大理想的人，一定不会办让人失望的那种建筑学。我觉得北大就是全世界学习关于中国文化最好的地方，如果我的研究还在中国，我就不会离开。

LAC：对于北大现在的几位老师，在北大这样一个环境里存在着怎样的认同感呢？

董豫赣：我们都是老师，这是不是共同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如果老师的目标都很一致的话，学生该有多遭殃。学生是不同的，有人喜欢中国古建筑，有人喜欢现代建筑，有人喜欢家具。如果这几个老师拧成一团绳了，变成一个人了，那学生该怎么挑老师？也许只能看王昀老师比较帅，或方老师比较酷，可这就不是在挑专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恰恰是这种观念上的不太一样，才会更具有吸引力。中国的理想理想是，和而不同。

景观设计需要现世关怀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eeds Concern of the Time

李迪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生态学会城市生态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生态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

Dihua LI: Vice Dea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raduate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Urban Ecology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Ec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Member of the Urban Eco-development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Urban Planning Society of China.

LAC：您能否用一句话总结这13年来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学科建设的历程？

李迪华：理解国家需求，创新办学，与国际接轨。

LAC：这13年来北京大学的景观教育积累了很多经验，在新的学院成立以后，哪些传统需要继承和发扬呢？

李迪华：现在还不能说是传统，但是我们积累了自己有特色的、北京大学的办学经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从基础教育、实践环节教育、学科研究几个方面相结合的办学思路。具体包括：第一，理解国家需求，从学科基础构建到到教学模式都立足于服务国家需求，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体系。第二，建立在实事求是和理解国家需求基础之上的学科创新。我们的学科创新，不是在一味地模仿西方，而是充分研究西方，理解西方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们的毕业生越来越受欢迎，我最满意的是，他们告诉我，离开学校3年仍然感觉到自己的知识结构、技术手段不落后。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学生在北京大学掌握的是如何自我学习、如何能够独立地研究实际问题、并提出问题解决方案的方法。第三，重视研究，无论是规划，还是设计都先做研究。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必须独立地做研究、发表论文，论文选题必须针对社会实际问题。第四，与国际接轨。我们采取的是“以请进来为主，适当走出去”的方式。从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成立以来的8年中，邀请国外的学者做学术报告超过50次，从2001年开始每年最少有一次与国外大学合作的设计研讨课程（Workshop），有超过20位外籍教师来研究院进行一个月以上的研究生教学，从2006年开始每年组织一次研究生集体出国研修。

LAC：您指出北京大学的办学理念响应的是国家的需求，那么国家需求具体是什么呢？

李迪华：国家需求本身属于宏大语言。具体到真正的教学里面，国家需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直接理解为：今天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具体包括：人地关系紧张问题、生物多样性问题、水资源短缺与水环境污染问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问题等。这些问题对于学生来说都是非常具体的，而且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有一点需要注意，我们并不研究和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只是从景观设计学专业出发，提出自己的方案。在我们的教学中，特别重视培养学生走进社会，用自己的感受和双眼去发现这些问题的能力。

LAC：您上面提到北京大学学生毕业后3年知识结构不落后的问题，那么是怎样一种框架能够让知识结构不落后？

李迪华：从某种意义上，学生说他的知识结构不落后，包含两重含义：首先指的是俞孔坚教授提出的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的“反规划”理论，多解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理论与方法，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等规划与设计理念、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其次是指他们的学习、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不落后。在北京大学，特别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强调通过研究提出问题解决方案。我们一位毕业生去找工作，错过了招新考试，被要求给正在做的一个实际项目出一个方案。过了一个星期，这个学生带着一份自费去完成的场地调查报告和方案去见用人单位领导，并说“没有场地调查，没有方案”。凭着这种工作精神，这位学生顺利地被录用了。北京大学在这方面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我们时常提醒学生，不是看哪本书就可以出方案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把很大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调查研究方法培养上，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应用掌握的知识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毕业了，这作为一种能力和工作方法、工作态度，继续保留了下来。

6. 李迪华老师带领参观当代景观优秀案例 © 李迪华
7. Dusan Ogrin教授讲授中国古典园林艺术 © 李迪华
8. 韩西丽老师带领学生在顺德高贺村祠堂与村民交流讨论 © 李迪华

LAC：您认为北京大学会有哪些教学计划和课程的设计来使自己区别于中国的其他设计类院校？

李迪华：我们没有刻意将自己和兄弟院校区别开来，但努力地让自己的办学具有特色。目前我们比较有特色的核心课程，主要包括景观社会学、景观设计理论与方法，建筑中心的空间与设计、古典园林研究和建筑历史等。景观设计学的几门专业课程中，景观社会学实际上解决了学生跟社会接触、研究基础能力培养的问题，景观设计理论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在不同尺度下理解人与土地、土地的自然过程以及土地问题解决的设计途径。在设计项目中，理解人与空间、建筑以及其他环境要素之间联系非常重要。

如何通过课程设置更好地促进人才的培养，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探讨，但思路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考能力的培养，首先是感性能力：感受存在的能力。现阶段的高校教育现状是，学生到了研究生阶段，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感性能力了，所以大家能够包容所有各种不雅的、失当的和看不顺眼的东西，比如随地吐痰、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不人性化的因素等，丝毫没有去改进的动力。感性能力的丧失，部分原因是教育的结果。第二是发现和归纳联系，也就是分析和研究能力。探究事物，最重要是要理解它的内在与外在联系，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如何来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呢？一定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对事物的理解，才能帮助找到适应性的解决方案，因此，第三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LAC：您认为一个优秀的设计院校，应该具备怎样的教学系统？

李迪华：第一，充分理解学科。无论景观设计学，还是建筑学，都是综合性应用学科，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之上的应用学科。理解了这点，就知道，必须让学生掌握能够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第二，要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但是这些还不够，因为我们是应用学科，还必须具备应用学科的特点，因此，第三，要具有应用理论知识来解决今天实际问题的分析与研究能力；第四，掌握所谓的规划与设计方面的技术手段，具备提出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这些够了吗？还不够。第五，还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因此，教学系统设计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需要不断结合社会需求和学生实际探索创新。从知识结构来说设计师是通才，但是通才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设计师、规划师。设计师还必须具有研究能力和想象力，必须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技能，或者具有这方面的意识。所以设计师、规划师，应该是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人来做。偏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设计师，但是他得掌握相关知识，具有人文关怀和对今天的现世关怀。

LAC：新的学院成立之后，教学方面会注入哪些新的内容？

李迪华：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受到人员等条件以及我们自身师资条件的限制，操作中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几年着重发展的是景观规划领域的前沿内容。实际上，多年来一直特别想发展跟艺术结合得更加紧密的景观设计。在成立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之前，就已经跟建筑中心开始合作，在全日制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景观设计硕士专业学位，FMAL）培养方案中，设计了“空间与设计”专业方向。设计要理解空间、理解空间语言，我们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了，未来如果有新的元素的话，应该是在这方面的加强。第二是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融合与交流，如发展城市设计，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期待。

LAC：新学院成立是不是意味着建筑和景观两个学科在北京大学会有一次大的融合？这个融合的交叉地带是不是也会有所扩大？

李迪华：那是肯定的，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发展不必拘泥于现状，我们会在借鉴景观设计学和建筑学已经取得的经验，希望北京大学在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土地设计和国土规划等国家需求中，在未来形成有北京大学特色的理论研究和专业实践领域。建筑与景观相互交叉，又互为基础，理解了景观，理解了空间，再去做建筑设计，肯定会有新的想法。反之亦然。两个学科群的融合，还在于理论研究的交流，我相信一定会通过相互促进和创新发展形成有特色的建筑与景观前沿研究领域。

LAC：您能谈谈建筑和景观教育在对空间的理解上的不同吗？

李迪华：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空间的理解。当我们谈到空间的时候，不能回避这样的现状，很多设计师对于空间概念的理解是抽象的。一个例子是，近日举行的面试推荐研究生现场设计考试中，场地是一个由3栋建筑围合的狭窄空间，考生提交的图件中90%忽视了场地与周围建筑的空间联系。对景观设计师或者建

筑设计师实际工作而言，它不应该是抽象的。如何把抽象的空间变得不抽象呢？这就需要人的空间感受。例如我们为什么在许多景观效果图里会模拟几个人像进去？其目的有两点：一是帮助理解人与空间的关系，也就是尺度，这是浅层的。二是人的空间感受，这是深层的，很多时候难以全部从图面上表达出来。空间能够和设计结合到一起来，人是主要因素，空间是介质，需要通过人的感受把各种空间要素联系起来。一种说法是，设计本质上是安排人在空间中的交流，或者说人的体验。

就学科内容而言，景观可能要复杂得多。建筑学和景观设计学的空间概念，都强调人性化和艺术的表达。理解景观的困难还在于它是生态系统，在这里，自然界的生态要素不仅仅是空间的组成部分，还常常成为空间的主体，比如说，城市建设好了，河湖水面消失，鸟兽虫鱼跑光，草木皆新，一定不是好的规划与设计成果。

无论是建筑还是景观，都是应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即设计理论。我们今天的设计理论还基本上起不到指导学生理解和创造性地应用设计语言的作用，还停留在对传统的诠释和对已有的设计成果的抽象归纳与分析上。100多年前的欧洲，艺术家们就开始把点、线、面、立方体和颜色等基本设计语言当成数学问题来进行研究和做实验，比数学中分形学的诞生早了近100年。在欧美国家城市中考察设计作品，很容易发现，无论使用的设计语言多么复杂，但是给人的感觉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像屈米（Bernard Tschumi）的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一条方形的运河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在拐弯的地方，他做了一个圆。诀窍在于，从某一个角度去观察时，前面的球型音乐厅倒影正好落在拐角的圆形水体中！这是经过设计的，设计师是有空间感受的。

LAC：景观的空间跟建筑的空间方法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具体应用方面其实是不一样的？

李迪华：大体是一样的。因为我这里把建筑界定为室内空间，室外就变成景观了。这样区分，才能把这问题探讨清楚，否则讨论就没有共同语言了。以建筑为主体的外部空间，理所当然仍然是建筑的组成部分，是我们理解的景观的一部分，主体不同而已。正是这样的交叉，使建筑与景观的结合、建筑与环境的交流变得至关重要。

LAC：在景观中，空间是怎样产生的？通常大家会觉得景观是通过水、植物、实体的建造来营造的，但设计师对空间的评价视角往往和普通大众不一样，您如何解释这点？

李迪华：景观设计就是在做空间设计。设计师和公众的认识差异是因为他们对空间的概念不一样。今天那些经过职业训练的人，他们理解的空间是抽象的空间。各个方面的原因，今天很多设计师懒于像普通游客那样去体验空间，这导致他们还不如那些普通游客，游客会基于自己的感受去体验实际空间。不少设计师不仅忘记了这很重要，他们还很强势，总认为自己的设计就是对的，只要做出来就会是好的。

所以，空间体验、空间感受是设计师谈论空间的根本，这就应验笛卡尔（Rene Descartes）在他的《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书里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普通老百姓的推理，可能比读过很多书的人、专业人士的推理更加可靠。”当然我们不能断章取义，不是说没有读过书的人推理比读过书的人的推理还强。笛卡尔用的词“可能”其实很准确。普通百姓的推理能比什么样的人更加可靠呢？笛卡尔所言的普通老百姓指的是那些掌握了大量没有用的、不能跟实际结合起来的、离散的知识的人。普通百姓善于从自身经验出发，反而有可取之处。为什么今天中国难以诞生更多优秀设计师，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忙碌在设计职场的人们已经没有空间感受了，几乎都变成画图机器了，他们对空间的敏感程度甚至不如那些有生活激情的市井百姓。

LAC：您认为在景观的观赏和评价标准中，实体的空间感受要放在第一位吗？

李迪华：当然，对实体的感受肯定是第一位的。今天设计师们谈论的空间多是抽象的，所谓是抽象的就是说空间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某种或者几种固定模式，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复制，超出了自己已经掌握的模式，就视而不见。我们正在谈论的空间是具体的，不能是抽象的，就是说空间一定要跟特定的场地，具体的人文与社会历史条件，具体的自然历史过程结合起来。很显然，理解空间，需要借助于已经累积起来的丰富的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这决定了无论景观设计师还是建筑师都需要接受系统的学科教育，并有随时补充必要知识的学习习惯，否则，我们和到此一游的观光客有什么区别呢？！又怎么能够带给他们新奇的体验呢？！

LAC：我们这届大会的主题是生态都市主义和新美学，您能阐释一下这个主题的含义吗？

李迪华：我们要改变现状，今天的社会尤其在设计教育里面，一直是在抽象地讨论景观的“美不美”的问题。很多情况下，这些讨论中关于“美”的标准是自相矛盾的，需要更新。

我个人认为，所有不符合这个时代要求的所谓美的东西，都应该受到质疑。通常情况下，人们很难区分开新的与旧的，还习惯性地趋向于维护已经有的东西。这样的现状下，今天需要特别提倡创新，让新的彰显出来。这就是李泽厚提到的关于艺术和美学的悖论，首先艺术具有永恒性，另一方面，艺术需要发展，需要不断添加新的元素。正是因为艺术的改变、发展才诞生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艺术的传承、美的传承。当你不去改变的时候，传承艺术或者传承美，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所以，在探讨新美学，更重要的不是思考过去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延续下来，而是如何能够创造性地解决今天的实际问题，在利用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提出今天景观问题、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同时，创造出新的美学形式，因此希望提出新美学概念来解决部分问题。

在创新设计形式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构建跟传统的联系。比如在一个历史建筑旁边如何做设计，第一种方案是建和旧建筑一样的一栋新建筑，第二种是保持或者恢复原样，我觉得第三种更可取，该做的设计一定要做，比如建一栋新建筑，但是想办法让新建筑与旧建筑之间取得联系，让它们两者之间给人的感受是协调的。

新美学是在观念、理论和实践层次的尝试与探索，尤其强调通过实践推动观念的革新。新美学不一定是形式上的，更不是抽象的，是在解决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应用人类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手段，提出新的问题解决方案过程中的观念革新。新美学不是为了观念革新而提出的一个新名词，而是通过突出与实践结合的设计创新，包括非常重要的应用生态学知识，解决今天人类环境问题中的艺术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如何与传统保持一致，或者协调的问题，但是，思路是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关于生态城市主义，它是对于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到底由谁来主导的一个反思。在这之前还曾出现过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和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现在大家意识逐渐到，在今天全人类面临这么多全球环境问题，不同尺度的环境问题的背景下，生态学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武器，所以学科的主导应该是生态学来主导，这与新美学是一致的。生态学可以成为我们进行景观设计方法和观念创新的基石和技术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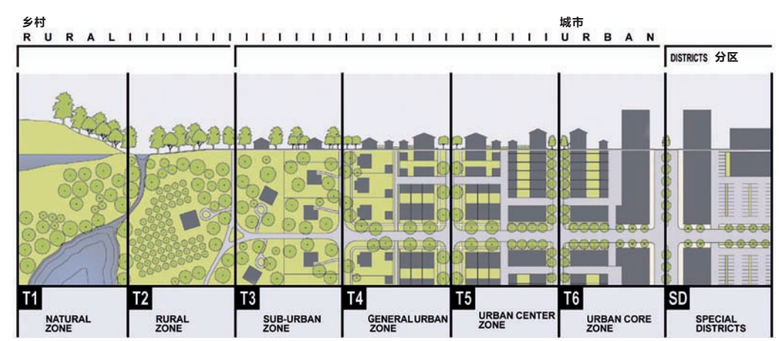
理论只有在实践的不断反馈与修正中才愈加完善
Only by Continual Feedback and Revision in Practice Can Theory Be Promoted

王晓川：AECOM规划+设计北京规划总监，资深助理董事。
Xiaochuan WANG: Senior Associate Executive, Director of Planning of AECOM Planning+Design, Beijing.

LAC：我们了解到您最近正在翻译一本关于美国城市设计控制体系的专著——*From-Based Codes: A Guide for Planners, Urban Designer, Municipalities, and Developers*，此书中探讨了基于精明增长（Smart Growth）以及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规划原则的精明准则（Smart Code），请问您如何理解新都市主义以及在新城市主义指导下的城市建设活动？您认为继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后的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生态城市主义（Ecological Urbanism）这些概念有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

王晓川：这本书于2008年底在美国出版，是一本关于精明增长、新都市主义的实践手册。大概在1996年的时候美国出台了《新都市主义宪章》（*Charter of New Urbanism*），其中就界定了整个新都市主义的主要原则。这一理论的主要背景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都市发展：快速城市化进程，城市向郊区蔓延，侵蚀了很多农田、基本绿地、开放空间等等现象，这种蔓延式的发展造成了不够集约的土地利用，以长距离的汽车交通为主，适合步行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提出了新城市主义，主要就是倡导城市的紧凑发展、TOD公交导向开发（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比较适宜步行的邻里社区等等。在新都市主义原则下有很多的实践，包括美国很多区域。正在翻译的那本书主要涉及到精明准则这样一个核心的内容，强调可持续的社区、旧城更新、新城适度的紧凑发展、TOD交通模式、还强调资源节约利用，建筑功能混合及适当高密度等等。精明准则的组织原则是首先把城市进行了分区，大致分为6个基本的断面分区：从乡村到市郊一直到城市核心区域，这是依据各区不同的形态和土地使用特征来进行划分的。比如乡村地区的建设形态是比较田园式的；郊区会有一些低密度的、分散式的村落以及别墅式的建筑；城市区域就会是各个功能混合的区域；再到城市核心区，就是比较高密度的，比如CBD。通过挖掘不同区域的特征界定分区，然后针对各个分区提出控制导则。当然导则也关注到了特殊的边界区域，比如城市核心区到城市中心区，或者从郊区到乡村的地区，存在一些过渡地带，如何考虑各种过渡区域的使用和控制也有相应的一些规定。

如果从学科的视野来看，新都市主义及其后的景观都市主义和生态城市主义这几个概念是从不同的专业视角来看待城市的问题，是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所面临的问题的不同而提出来的。比如最早作为都市主义里程碑的《雅典宪章》（*Charter of Athens*）是建筑师提出的，其实当时学科还没有这么分化，当时是建筑来主导，发展到现在已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体。所以这几个概念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而提出来的。当然它们的背景不一样，它们的初衷或者它们解决问题的针对性也不一样。景观都市主义是站在把景观作为生态基础设施，作为城市的一个发展的基底来考虑的，以往的城市发展过渡地注重了城市中的建筑实体空间或者说它的一个功能性的方面。生态城市主义则是从生态伦理的视角出发，应该使环境和生态伦理成为多学科的考虑。目前生态城市主义还需要形成一个多学科的共识，强调生



9 9. **精明准则分区**

态取向的城市设计理论，让大家，比如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景观设计师等专业人士共同面对挑战，如何使城市发展走上生态规划之路。

LAC：在贵公司的工作实践中，您是如何将国际前沿理论，如新城市主义及目前提出的生态城市主义理念融入到项目实践与创新中？

王晓川：其实一个新理论从它的提出到形成共识，再到最后通过各种角度的实践反馈再修正理论，完善这个理论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新都市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来，到1996年有了新都市主义的宪章，一些主要的基本原则已经界定的很明确了，这其间也经历了很多具体的实践，来修正和丰富这个理论，现在新都市主义的理论还在不断更新。所以我想生态城市主义需要这样一个过程，刚刚提出来，可能需要行业内的专业人士形成共识，并能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完善这个理论。一些具体的实践也会反过来对这个理论有所印证或者是推进。

大家都知道，AECOM从一开始就是很注重设计、生态、经济与规划这几个方面的结合，为项目提出综合的DEEP（Design，Environment，Economic，Planning）解决方案。但不一定所有的理论，每个角度都可以直接与实践产生联系。在没有提出生态城市主义这个理论前，可能我们以前也有过生态城市设计的一些尝试，但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可能会更有意识、更加系统地在一些项目里把这种方法论融入进去。

LAC：以上这些方面——设计、生态、经济和规划，它们之间会有矛盾吗？

王晓川：应该说不会存在特别多的矛盾，如果存在矛盾是可以通过技术途径去解决的。比如说有的方案，如果说从环境角度的十分强调生态的保护与控制控制，可能与目前开发商的角度所衡量的经济收益是存在矛盾的，但是就看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肯定不会是出色的解决方案。

比如大家比较关注的低碳设计，现在低碳在国际上也是一个主要方向，但由于目前中国的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的城市第三产业发展得比较好，有的还处于工业经济发展阶段，有的还处于农业经济阶段，是不是都应该一味低碳？低碳其实是一个手段，是一种技术途径，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但是现在中国很多基层政府把它列入一个类似GDP一样的另外一个考核指标，甚至拉闸限电，限制企业的生产，甚至到限制居民的用电。低碳作为一个生态优先的技术途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不应该是单一目标。生态、经济和设计之间是能形成一种平衡的，不同专业的融合有助于平衡美学、生态和社会的多重目标。

传统只有在成为我们解决目前问题的工具和资源时，才是活的
Only If It Becomes Our Tools and Resources to the Current Problems, Can Tradition Be Alive

张旭东：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
Xudong ZHANG: Ph.D in Literature, Duke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ean and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LAC：您所专注的领域是文化研究，这一领域与景观设计相距甚远，您是怎样的机缘与俞孔坚老师相识，从而对景观设计领域提出见解的？

张旭东：我在纽约大学的中国中心组织过一个系列讲座，邀请国内各行各业比较出色的人去纽约做演讲，我征求了一些朋友的意见，甘阳就大力推荐俞孔坚。俞孔坚曾在中山大学做过演讲，效果非常好！所以我就和他联系了，我们在纽约见的，一见如故。当时我实际对他的工作还完全不了解。结果他做演讲，他大概讲了三五分钟我就觉得邀请他太对了，我对他的工作特别欣赏。

从大的方面来讲，为什么我们完全不相干的领域会产生碰撞？我们做文化研究的人，觉得虽然中国的经济现在是势头很好，但究竟哪些地方我们可以说真正在观念上、在形式上有创造性，并且能够说得出一套理论的，可以说各行各业都没有。所以我们有意无意地在找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以及学术思想，寻找那些能让人眼睛一亮，能成为当代中国整个创造性的一点注解。相对于学术思想，景观是具体的。首先它可见，它不管道理背后怎么讲，它是可以直观地让人感受的。它能很直观地打动人、说服人，有这样的例证在前面，背后那些更深刻的或者更复杂的理由说出来，大家都会感觉到，这个道理其实并不见得这么悬，并不见得这么复杂，而是很自然而然的。我觉得俞孔坚的作品就是这样一种代表，可以说很直白的作品，怎么能找到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直白的表述并不简单。

LAC：您作为一位文化学者，怎么看中国现在的景观行业？

张旭东：我觉得景观环境在日益恶化，非常糟糕。城市盲目地扩建，盲目地拆迁，盲目地追求GDP、现代化。很多的景观设计是非常有悖于传统中国人或者普通中国人，甚至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感觉是被强加了一种外在的、不加思索的理念。第一，在立意上可以说变得越来越千篇一律，到任何地方去看都差不多；第二是非常浪费；第三给人没有一种亲近感。这么盲目地消耗资源，盲目地追求大、奇，是将自然和人割裂开来的一种审美。自然本身是具有调节功能、平衡功能、净化功能的，自然本身是在工作的，我们现在把它的生机给扼杀了，然后我们自己拼命动脑筋怎样去弥补，其实是事倍功半、倒行逆施。

我想过去几十年，因为现代化的压力是全局性的、全方位的，任何人不可能逃开这个压力。在设计的实践中可能存在一种心理，认为采用了某种设计语言就代表了现代。我们也有这样的东西了，我们跟纽约差不多了，我们终于追上了。在现代这个概念面前的心理焦虑和要证明自己是现代的压力会逐步减缓。在我读书的年代所面临的压力是你们难以想象的，就在这样的压力下中国奋起直追地苦干了30年，取得了很多值得肯定的成就。但现代性造成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以前说污染，污染“好”，污染说明我们工业化了。就所有西方发达社会问题你要全去批判，国内知识界马上就会有这样的声音：我们还没有资格批判，不要把人家发展以后的问题拿来在我们今天还缺乏发展的时候来讲。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环境也很糟糕，但是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自然而然就会改，所以我们不要紧，慢慢来。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北京、上海、深圳已经感觉到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就要后现代，要环保了，要绿色了。

那是否就说天津、重庆，二线城市还应该继续重蹈北京、上海的覆辙？等到有一天了，面临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再来解决，那怎么可能呢！例如土人的理念肯定会在时空上有一个普遍化的倾向。所以我认为土人在中小城市，比如秦皇岛、中山这些地方的项目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如果能把一个非常前卫的理念，和还没有被完全破坏自然的环境、社会的环境、城市的环境结合起来，会产生没有美妙的组合。这会使得传统不需要经过类似沿海地区、一线大城市经过的那种破坏，中国的传统经验和传统智慧可以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与赋有见地的、高科技含量的、世界眼光的、批判型的、真正有创意的这种社会理念结合起来。

LAC：那您能否对您身边的景观点评一二？

张旭东：中国人现在家园的感觉是越来越淡薄。古代的人和自然、和文化之间是互动的。家的感觉那是非常具体的，比如说在诗歌、在山水画里面都有所体现。现在家园的感受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模糊。你在哪儿挣钱，哪个地方就是你的家。这就说没有人文的或者说乡土的、环境意义上的家的感觉。这当然不是景观设计领域的错，因为整个大环境是这样。

比如来看最早的先民是如何择地而居的，而且这个经验是普遍的经验，要有一些屏障、要有一种安全感、要靠近资源，空间反映了人在生存斗争过程中一系列的选择，这种选择包括审美的选择，而审美又和人的生产活动、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理解放在今天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今天的环境和以前打猎、采集时代当然是不一样了，但是怎样才能让我们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家园的感觉。现在很多的城市的环境让人觉得有一种恐惧、不安、压抑或者陌生，它实际上是跟人的要找到一个家、要找到一个定居点的基本的诉求是背道而驰，人不得不可怜地活在这么一个，让人觉得其实很不安全、很不舒服的环境里。我们说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叫“蚁族”，那怎么让这些蚂蚁重新活得像人？我们做文化理论的人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去呼吁，但是景观设计可以做很直接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个一个项目来改造人和环境的关系，重新阐释今天的人应如何理解自己和环境的关系。

LAC：刚才听您谈了很多传统的思想，您认为未来的设计师应该如何从传统中借鉴，从传统中汲取营养？

张旭东：传统的含义并不仅仅只有古典的传统这一层含义。一方面在中国传统内部包含一个所谓精英和大众的冲突。在五四白话革命的时候，提出针对文言传统的白话。所以胡适、周作人、鲁迅他们都说，白话早就有，白话不是说我们五四这一代人发明出来的，宋代话本小说就是白话，唐代的传奇就是白话，鬼怪故事就是白话，古人也有日常的美学、贫民的美学。另一个层面是一种新传统，新传统就是革命的传统，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传统。这包含的对我们父辈那一代人的功劳，或者是当代中国人马上就要被抹掉的记忆的承认。我们刚才谈到过去30年的建设是有功劳的，再往前推，难道过去60年的经验就没有功劳吗？基本的工业化是那个时候完成的，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时期的传统保留下来。

这样的传统是一种“俗”的美学，俗是正面意义上的俗，就像胡适他们提倡俗文学，是与整天哼哼唧唧的阳春白雪相对的，但是与生活经验相贴切的。但是这个俗，最后要放到高级的文化思想性里面谈出来，俗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俗，包括很多“雅”的东西。最终成为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创造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又回到当年的五四，当时就是提出要创造贫民的文学、大众的文学，要把引车卖浆者之流说的话变成文学。但是例如胡适、周作人这些领袖人物都说，并不是只是写那种劳动号子、民间歌谣，不是的，贫民的文学最后是要能与唐诗宋词、民间小说、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的文学。这才是贫民文学、俗文学、白话文学的真正抱负和志向。

LAC：我曾读您写过的一句话：“穿越西方，回到传统”是不是也是表达的这样一种思想？

张旭东：我们对传统理解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的环境，对自己面对的问题理解到什么程度。我们中国的传统是靠一代又一代的人阐述出来的，比如说《论语》是通过多少代人去注释它、通过著书将这个传统讲出来的。所以每一代都对这个传统都有增加，每一代人增加的东西都是这一代人将自身的经验编织到传统里面去，再讲出来的。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特的经验，就谈不上对传统独特的理解，继承传统不是去重复古人的东西。对传统的把握和理解比我们高明得多的以前的中国人，并没有挡住西方的冲击，挡不住马克思意义上的“廉价商品要冲垮中国长城”。到现在还是这样，只不过今天非常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的廉价商品在冲毁西方在想象里铸起那个长城，这个位置倒过来了，但游戏并没有改变。我们也挡不住绝大多数对基本现代生活的追求——个性、自由、尊严、富足、自我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谈“回到传统”，只不过是空洞的口号，关键还是要面对新的问题。传统只有在成为我们解决目前问题的工具和资源时，才是活的。反过来只有传统在我们手里面一个活的东西，帮助我们再来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成为我们今天经验的一部分、智慧的一部分，我们才有资格谈我们对传统做了什么。所以“穿过西方”只是一个比方的说法，这个西方不是地域意义上的那个西方了，也包括今天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今天的物质条件和整个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现代性的前提下的，在现代的前提下去分东西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最绿的城市，更绿的世界
The Greenest City, the Greener World

罗品信：温哥华市市长，“快乐行星”企业共同创办人，被《加拿大环球邮报》列入加拿大全国“40位40岁以下最杰出人士”，荣获2004年道德行动奖。

Gregor ROBERTSON: Mayor of Vancouver, Co-Founder of Happy Planet Foods, Named one of Canada's "Top 40 under 40" by *The Globe and Mail* Newspaper, Winner of the Ethics in Action Award 2004.

LAC：温哥华的《最绿城市快速启动指南》（*The Greenest City Quick Start Recommendations*）中有一部分为“更绿色的社区”（Greener Communities），其中指出低碳排放量、清洁的水和空气、充足的公园及绿地等指标是”最绿城市“应该具备的特质。据报道，北京的绿化覆盖率为50%左右，而温哥华的绿化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所以我们想知道同为世界级大都市，温哥华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使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绿色？

罗品信市长：这个问题确实是目前世界各大城市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即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使居民能够在自己步行可达的距离内就能到达绿地。在房屋开发力度和密度加大之情形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要在高楼大厦间为民居留下绿地，营建公园。但是不管有多难，为了保护我们的生活质量，以及我们未来子孙后代的生活质量，这样的措施还是必须要实施的。温哥华过去几届政府也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成功地保护住了绿地和公园这样的面积，这也是为什么温哥华能成为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那么本届政府也不会停止这样的举措。现在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温哥华，也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住宅建筑，那么政府就要鼓励开发商来保护更多的绿地。像北京一样，温哥华在这方面也是鼓励建造更多的高楼，因为这样可以容纳更多的居民，那么周围的绿地面积就可以保证下来了。

LAC: 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目标数据呢？

罗品信市长：温哥华85%~90%的居民出门步行5分钟内可达绿地，一些欧洲国家在这方面达到了95%，甚至更高。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100%。我们正在为此而努力，因为我们的市民在出门步行的距离内能看到的只是一棵树，或是一小片草坪而已，并没有接触到自然。因此我们的绿地规划小组通过GIS技术在城市中寻找哪些地方还存在着可达性盲区，哪些地方还需要我们去营造绿地，使人们更为接近自然。

LAC: 在《最绿城市快速启动指南》中提出要为行人和自行车使用者提供更为安全的道路系统，并创建一个公共自行车项目。我们了解到，您是一名自行车爱好者，是吧？

罗品信市长：没错。

LAC: 那么您作为一名自行车使用者，您觉得温哥华的公共交通状况令您满意么？同时，您作为一名政府决策人，您觉得温哥华的公共交通系统对其使用者来说已经足够好了，还是仍有待完善呢？

罗品信市长：我们一直在完善温哥华的公共交通系统，但它仍不能够满足各年龄段、各层面的需求。对于我还有那些老练的自行车使用者来说，温哥华的道路网络已经挺不错的了，但是我们还是见不到许多骑着自行车的老人和小孩的身影。所以我们的目标便是创建一个可供人人享用的城市自行车道路网络。众多其他城市也都以此为目标，来确保每个骑车人都对道路状况放心。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制定了一些独立的自行车线路，也改善了路面状况，为自行车爱好者增添了一些设施。我们完善该系统的工作进行得很迅速。

LAC：您平常出行时会选用哪种交通方式？

罗品信市长：差不多都是骑自行车出门。

LAC：和伦敦市长一样。

罗品信市长：对。我觉得我可能要比伦敦市长骑得更多。在伦敦骑自行车要比温哥华更有挑战性一些，因为伦敦比较大，而温哥华的城市比较紧凑，所以我可以在10分钟内从家骑到商业区，这要比开车、坐有轨电车、乘出租车更为快捷。骑自行车出门不用去绕路，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一点的话，自行车对你来说就会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出行之选。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这种便捷带来的舒适，并尽量地选择骑自行车出行。现在人们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感到道路还不够安全。

LAC: 您之前到过广州么？

罗品信市长：还没有。我去过北京、上海和香港，此次中国之行将是我第一次访问广州。

LAC: 广州和温哥华是友好城市，温哥华今年已经成功举办了冬奥会，而广州也是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的东道主，那么您认为举办重大事件会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带来哪些重要意义？

罗品信市长：举办重大国际赛事是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机遇。拿今年的温哥华冬奥会来说，我们修建了从机场到城区的快速列车。我们建立了世界上最绿色的社区——温哥华奥运村——我们将奥运村的建设视为一种投资优秀的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方式。我认为，广州亚运会也将成为一个展示广州风采的重要窗口，对于作为亚运会东道主的广州会进行如何的改造以提升城市形象我将拭目以待。

LAC: The Greenest City Quick Start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proposals for a lower carbon-footprint, clean water and air, abundant parks and green spaces, as well as other "Greenest City" targets. Vancouver and Beijing are two of the world's great cities. Beijing's green space coverage is about 50%; in Vancouver, it is reported as over 80%. We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detailed plans about goals for making the city greener?

Mayor Gregor ROBERTSON: Access to green space is very important for quality of life. We see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striving to improve access and the amount of green space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from homes. It is very challenging with development pressure and the density of housing to allocate space for parks, but this is a commitment that we must make for the future and for our quality of life. In the past Vancouver's leaders protected park space throughout the city, and this makes our city so livable now. We can not stop and say the work has done. In Vancouver, as we add more people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we also have capital investment by developers to create more park space. Within our land use regulations, we target portions for green space. I think Vancouver and Beijing both have chosen to do more towers and more vertical developments to protect green space on the ground.

LAC: How much the greening rate goal you want to achieve?

Mayor Gregor ROBERTSON: The rate of public green space within 5 minutes' walk of residential homes in Vancouver is around 85%~90%, in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it is 95% or even higher. Our goal by 2020 is to get to 100%, which means everyone will be within 5 minutes' walk of a green space. We are working out how to fully define green space, because everyone is already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of one tree or a piece of grass, but that is not considered access to nature. Our team is using GIS mapping to identify the gaps and where we need to allocate natural green spaces so everyone has access.

LAC: The Greenest City Quick Start Recommendations also include making streets safer for pedestrians and cyclists and creating a public bike-sharing program. You are a cyclist, are not you?

Mayor Gregor ROBERTSON: Yes.

LAC: As a cyclist, what is your view on the role of cycling as a means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as a decision-maker, do you think Vancouver's pedestrian and cycling conditions are satisfactory, or do things still require improvement?

Mayor Gregor ROBERTSON: Our basic infrastructure is improving, but it is not yet good enough to attract people of all ages and abilities. Our current network is fine for me and for people who are experienced riders, but we do not see many children or elders riding bicycles. Our goal is to create a bicycle network that serves people from ages 8 to 80. It is a goal used by many cities now to ensure that everyone feels safe and secure riding bikes. We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We have made big progress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in creating separate bike lanes, and improving road surfaces and facilities. We are improving the system very quickly.

LAC: We would also like to know how do you get around ordinarily?

Mayor Gregor ROBERTSON: Mostly on my bike.

LAC: Like the Mayor in London.

Mayor Gregor ROBERTSON: Yes. I think more than the mayor in London does. London is more challenging for cyclists than Vancouver because it is a bigger city. Vancouver is a compact city: I can ride from my home to the business district in 10 minutes. Cycling is faster than cars, or trams, or taxis. It is very direct and close, so it is very convenient when you are confident. And I hope everyone can feel that sense of comfort, and be able to choose it. Right now sometimes people do not choose bicycles because they do not feel safe.

LAC: Have you ever been Guangzhou before?

Mayor Gregor ROBERTSON: No. I have been to Beijing,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is will be my first time going to Guangzhou.

LAC: Guangzhou is the Sister City of Vancouver, and you had successfully held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hile Guangzhou is the host of the coming Asian Games this year, so what are the significances do you think holding these important events to the cities' development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Mayor Gregor ROBERTSON: Huge global events are a big responsibility but also a big opportunity to create better infrastructure. For the 2010 Winter Olympic Games, Vancouver built rapid trams lines from the airport to downtown. We built the greenest neighborhood in the world, the Olympic Village, and used the Olympic as a tool to invest in green infrastructure. I think Guangzhou hosting the Asian Games is a big opportunity for the city to showcase itself. I am very interested to see what changes and investments have been made to enhance the city for the Games. ■

10. **温哥华海湾建筑鸟瞰**
11. **温哥华**Woodward**区环境**